

探索实施中华文明大展工程 健全中华文明展示传播体系

柳士发

中华文明需要寻根探源。我们助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主题宣传推介活动，推动探寻中华民族之源与流，促进找回中华儿女的根与魂。在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致敬考古先贤，礼赞中华文明，我们遴选推介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进而举办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出版《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图书，并且举办中华文明探源论坛，继续开展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主题推介活动，努力通过深入挖掘阐释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实证一百多万年的中华民族史、一万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史、五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史。见证从中华古国文明经中华王国文明再到中华帝国文明的演进脉络，从中华古国文明经中华王朝文明再到中华皇朝文明的发展历程，力图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亘古追问。

中华文明需要展示传播。我们围绕中华文明主题主线，开展中华文明大展主题宣传推介活动，探索组建中华文明大展全国矩阵，完善中华文明展示传播体系，并且举办中华文明大展论坛，成立中华文明大展联盟，实施中华文明大展工程，健全中华文明展示传播体系。既需要坐而论道，又需要起而行之，更需要言必信、行必果，既需要搭建总体框架和基础平台，又需要纵向贯通横向联动，也需要层层分解步步为营。应当遴选推介中华文明百大常设展览，率先组建中华文明大展核心方阵。聚焦东亚两河文明，应当开展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主题宣传推介活动，举办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探源论坛和大展论坛，尝试成立长江文明大展联盟和黄河文明大展联盟，探索实施长江文明大展工程和黄河文明大展工程，组建长江文明大展联盟和黄河文明大展联盟，探索实施长江文明大展工程和黄河文明大展工程，组建长江文明大展联盟和黄河文明大展联盟，探索实施长江文明大展工程和黄河文明大展工程。探索实施长江文明大展工程和黄河文明大展工程，组建长江文明大展联盟和黄河文明大展联盟，探索实施长江文明大展工程和黄河文明大展工程。探索实施长江文明大展工程和黄河文明大展工程，组建长江文明大展联盟和黄河文明大展联盟。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中华儿女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厚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许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地以及更多尚未甚至未必要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地一个个如星辰般的中华文明主题公园，早已成为蜚声中外、闻名世界的旅游目的地。中国大长城作为亚欧大陆最长的宏伟段落，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运河名录最长的人工河道，还有北京故宫、敦煌石窟等众多中华文化遗产，即使放眼全球都是令人惊叹的世界奇迹。《汉书·西域传》曾称黄河为中国河。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铸有“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的铭文，堪称中国尊，昭示至尊中国；1952年湖南省长沙市伍家岭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镜铸有“中国大宇，子孙益昌”

的铭文，堪称中国镜，昭示维新中国；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织锦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文，堪称中国锦，昭示锦绣中国；1969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遗址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铜奔马1983年被选作中国旅游标志，昭示奔驰中国；2001年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的高周时期太阳神鸟金饰2005年被选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昭示腾飞中国。一处处中华文化地标仿佛一颗颗珍珠璀璨夺目。文物是岁月的化石，历史的物证，内含文化基因，蕴藏文明密码。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讲好中国文物背后的故事就是讲好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故事。

针对考古发掘成果，我们已经遴选推介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并将持续开展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主题宣传推介活动，推动实施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览展示工程、图书出版工程和影像纪录工程，统一标准、格式和体例，争取每项考古发现都能举办一个常设展览、出版一部配套图书、摄制一部配套纪录片，从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览展示工程及配套书系和纪录影片。针对文物展示点，我们可以遴选推介中华文明百大常设展览，并且推动每个展览出版配套图录，摄制配套全程讲解视频，争取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华文明核心展览展示工程及配套图录和讲解视频体系。整个中华大地就是一座伟大的中华文明主题公园，每一处不可移动的文物都可以视为中华文化地标，每一件可移动的文物都可以视为中华文明标识，但从实操效果来看，范围过于宽泛不足以突出重点亮点，选项过于精简不足以辐射整个社会。针对文化遗产地，我们可以开展中华文明主题公园宣传推介系列活动，举办中华文明主题公园论坛，成立中华文明主题公园联盟，遴选推介百大国家文化遗产公园作为中华文明主题公园，形成中华文明主题公园全国矩阵；针对不可移动文物，我们可以举办中华文化地标主题宣传推介系列活动，遴选推介百大中华文化地标；针对可移动文物，我们可以举办中华文明标识主题宣传推介系列活动，遴选推介百大中华文明标识，并且推动分别出版配套图书、摄制配套纪录讲解视频，进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华文明主题公园、中华文化地标和中华文明标识展示传播体系。特别是在云时代，我们可以通过云展览、云讲解、云直播、云论坛、云上大讲堂等各种有效方式全方位开展上述中华文明“五个百大”云传播。我们应当而且完全可以提纲挈领、以点带面，争取各级各类文博机构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成立中华文明展示传播联盟，通过实施以“五个百大”——百大考古发现、百大常设展览、百大主题公园、百大文化地标和百大文明标识遴选推介活动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展示传播工程，亮点纷呈而又全面系统地展示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伟大与光荣、灿烂与辉煌。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需要传承保护，更需要创新发展。我们可以尝试以会带展，举办中国文化遗产大会，定期集中展示中国文化遗产工作新成就。我们可以探索跨界合作，兴建中国文化遗产元宇宙，奋力开辟中国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边疆。

《论语》中的文物古迹——舞雩坛

陈晶 张帅

“舞雩”这个地方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论语》的名篇《侍坐》当中，这篇记叙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子”言志的篇章历来被儒家奉为经典，概因曾皙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异志，也正是孔子本人的志向与理想。有学者认为这寥寥数字描绘了礼乐治下的和乐景象，正是孔子与儒家大同社会、理想家邦的最高境界。另一则“舞雩”记述了弟子樊迟从游孔子在此问学的场景，从侧面反映了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并不拘泥于课堂，形式触类旁通，有教而无类。由《论语》观之，孔子及其弟子生活的时代，“舞雩”是鲁人出游的主要去处之一。

古代文献记载中“舞雩”在曲阜鲁国的南郊。《水经注·泗水》云：“门南隔水，有雩坛，坛高三丈，曾点所欲风舞处也。”北魏酈道元记载的“门”是鲁国城南西门即雩门，“雩坛”在门南，中间还隔着一道水流，但并未言明河流之名。《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一载：“舞雩坛，在沂水之南，当（曲阜）县南六里，临沂水。”沂水有青州之沂称大沂水，有徐州之沂称小沂水，小沂水流经曲阜又有支流。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俞舜凯所立的《鲁国之图碑》（该图获得比立碑早约30年）中有“雩水”即小沂水，三条支流在鲁国城西南汇合，北为庆源河绕鲁城东，西南流，今已干涸断流；中间河流称“连泉”，是连接连泉的河流，与小沂河相符；南为沂水主河道，今称大沂河，北宋乐史说舞雩坛“在沂水之南”是对小沂河而言。按北京大学李零先生对《鲁国之图碑》的解读，雩门外有四处乡里，即雩坛里、芳桂乡、泉台里、雩舞里，舞雩里与“舞雩”有关，“雩”也与之相近。鲁城外的这一带是个风景区，有泉曰泉，有泉曰泉泉，泉官有台，曰泉台，这与《论语》中的记述完全相符。他故而怀疑，泉台就是舞雩坛。明崇禎刻本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续修的《曲阜县志》中有舞雩台的记载：“在县南三里，曾点风乎舞雩即此。”又言温泉、连泉，“（温泉）在县东南五里，沍寒时水温可浴，西流入沂，即曾点所谓浴乎沂是也。”“（连泉）在温泉西水中，石如伏甃，怒蹇，活泼可玩，西流入沂。”该志中“温泉”“连泉”现已不存，若非杜撰则从前曲阜南郊这一带有冬季可沐浴的温泉，有可以观赏的奇石，又有舞雩之台，也可与《论语》中“风乎舞雩”“浴乎沂”和游于舞雩相互印证，“舞雩”概在今曲阜城南泉村附近。

1977年鲁国故城的勘探中，对舞雩台遗址进行了探测。其位于鲁国城东门正南1735米，南泉村西南约500米，坐落在小沂河南岸，雩河（大沂河）之北，亦称雩坛或舞雩台。台基近方形，东西120米，南北115米，残高7米，有两层。上层东西残宽60米，南北残宽65米，残高5.3米。其高度按照北魏一尺合0.27974米计算，三丈约合8.5米左右，与《水经注》记载高度相近。就其夯土结构观察，当



修筑于春秋以前，而沿用至西汉时期。舞雩台出土刻有“虞虞”二字的东汉刻石。据已故的曲阜文管会孔繁银先生记载：台上原有石碑4块，2石刻“舞雩坛”，一为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除平判判官署曲阜县事莆田陈文信立，一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山东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吴郡周天球书，亦署莆田陈文信立。1石刻“凤翔千仞”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汝南吴同春题。1石刻“圣贤乐趣”时代不详。碑阴记为：“孔子游舞雩，樊迟从而问学，夫子告之，圣贤乐趣故不在山水之间也，余登斯台尔有崇德、修德、辨惑之想，于是乎书。”由《论语》樊迟舞雩从游。曲阜师范大学路承烈先生记载：孔庙奎文阁前东碑亭原存从舞雩坛移人的石碑1块，碑文是：“大明嘉靖丙寅孟秋朔旦 舞雩坛 署曲阜县事东平判官莆田陈文信立石”，此碑立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言台上原有另一“圣贤乐趣”碑，概与孔繁银先生所述相同。

舞雩的由来要从西周封建建国说起，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随即分封天下，周公旦以既亲且贤被封在少昊之虚曲阜，其子伯禽就封建都于此，是为鲁国。周公功勤著，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中曾记载：“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文献有载，周天子祭天之礼有九种，鲁国享有其中的两种，即祭天求雨之礼和郊祭上天之礼。祭天求雨又称“雩祭”，故鲁国遗址有雩坛。《周礼·春官》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公羊传·桓公五年》载：“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雩，旱请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皇侃《论语集解疏》云：“舞雩，请雨之坛也。请雨祭谓之雩。雩，吁也，民不得雨故吁雩也。祭而巫舞，故谓之舞雩也。沂水之上有请雨之坛，坛上有树木，故人沂浴，出登台，庇于树下逐风凉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英杰先生指出：雩坛例行的祈雨之祭一般在每年四月。《左传·桓公五年》载：“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筮而蒸。过则书。”“龙”是天象中的东方苍

龙七宿，每年四月黄昏开始出现在东方，这时便要举行雩祭，意在提前为百谷祈雨。此外在遇到大旱天气时也要雩祭求雨。这就超出了每年行一次雩祭的常规，故被史书记载了下来。《春秋》中记载鲁国举行的不时之雩祭有二十一次。雩是呼吁求雨的声音，行雩祭时，要有人起舞而呼雩。故称祭天求雨之坛为雩坛或舞雩坛。需要关注的是，舞雩坛并非鲁国南郊祭天的圆丘，《水经注》言圆丘在沂水南，高四丈；《太平寰宇记》言圆丘在县南七里；《鲁国之图》所绘圆丘在雩水南，即大沂河南，舞雩坛与圆丘并非一处，亦非一用。

关于孔子及其弟子到舞雩，并非可分为游乐说、雩祭说两种。游乐说以朱熹为代表，《论语集注》有言：“春服，单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沂，水名，在鲁城南，地志以为有温泉焉，理或然也。风，乘凉也。舞雩，祭天祷雨之处，有坛树木也。咏，歌也。”也就是春天在沂水畔的舞雩台，人们会着单衣沐浴吹风，清除污垢，感悟春日。周代就有除凶去垢的“被除”仪式，后世演变为上巳节“被濯”的民俗，农历三月初三日结伴到流动的河水中洁净身体，祛除凶疾即源于此。单纯雩祭说以王充为代表，《论衡·明雩篇》认为：鲁说雩祭于沂水之上。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应涉水不浴，只是进行雩祭。清刘宝楠认同王充的说法并加以修正，认为雩祭在正岁四月，非二月，亦认为浴为被濯，较《论衡》涉水更为确切。游乐说与雩祭说一闲适，一则庄严，与孔子时代沂水畔的秀美风景，由来已久的祈雨之祭均不相宜，舞雩坛一带是鲁国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

1961年，国务院将曲阜鲁国故城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舞雩坛遗址是鲁国故城的重要保护单位之一。如今的舞雩坛，周边加装了石栏杆，铺设了广场，恢复了千年祭坛的气韵，成为游客参观、市民休闲的好去处之一。历经两千余年的沧桑，舞雩坛从鲁礼象征到沉寂荒芜，再到重拾往昔的辉煌，正是中华文化曲折向前、传承不灭的缩影，也是文物给我们讲述的精彩故事。



与会专家合影

3月6日至8日，太和城与唐宋时期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大理召开。会议聚焦唐宋时期都城考古经验交流，旨在推动太和城考古工作持续深入开展，突出太和城内涵价值阐释和对比研究，为太和城遗址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吉林、河北、安徽、江苏扬州、河南开封等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的20余名专家学者，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相关文博机构专家参会。

会议开幕式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总支书记、所长刘正雄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董新林研究员作主旨介绍，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赵薇致欢迎辞，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杨德聪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专家重点围绕唐宋时期都城考古发掘研究新进展、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工作理念与方法、太和城遗址考古研究及后续保护利用等主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太和城考古发掘揭示了南诏早期的都城面貌，南诏建筑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地方特色鲜明，太和城兼具山城与平原城的特点。”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忠华在题为《南诏太和城考古新发现》的汇报中，介绍了2014年以来通过考古调查勘探揭示的太和城结构布局，重点介绍了太和城考古发掘情况及发掘所揭示的大量建筑基址，并明确了下一步考古工作的方向。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以《南诏太和城遗址考古

发掘与保护》为题，根据考古新发现对太和城的历史沿革、基本格局及功能分区作了初步推断，并构建了以苍山、洱海、龙首城、龙尾城为南诏大理都城边界的宏观认识。他建议，以茶马古道串联起苍山洱海之间的南诏大理时期文物古迹，使“南诏大理史迹”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潜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研究员作了《长安未远——隋唐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思考》的汇报，回顾了梳理了65年来隋唐长安城的考古成果，对长安城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纳，提出下一步考古工作想法的同时，反思了都城考古、城市考古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在《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遗址的考古收获和思考》的汇报中，介绍了多年来对隋唐洛阳城进行的多维度考古发掘研究问题。提出今后将在既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城池形制布局、历史沿革与建筑风貌，精确绘制不同时期的城市平面布局图，对都城的礼制建筑、漕运水系、皇家苑囿、离宫仓储以及两京驿道等课题进行专项考古发掘研究，为遗址的保护利用和融合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开封市博物馆馆长葛奇峰研究员的汇报题为《开封城市考古的进展与启示》，介绍了近年来开封城市考古的新发现及其工作思路；要具备全局思维，注重构建城市整体时空框架；方法上要坚持多学科合作，拓展城市考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他认为，这些工作对黄泛区开展城市考古具有启示意义。同时，也应顾及城市考古也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在完成考古任务之外，科学有序



专家座谈

地融入文旅产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勃研究员作了题为《浅谈唐宋时期建筑的立向与相关定向测向技术方法之发展》的汇报，以泉州城、扬州城相关重要历史建筑的坐向为例，讨论了唐宋时期重要建筑的立向与相关定向测向技术方法的发展。他指出，进行城池考古研究时，在将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要素纳入调查研究范围的同时，有必要加强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解析城池、陵墓等重要遗迹的空间布局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副研究员的汇报以《杨吴时期的扬州城及其沿革——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的考古发掘与研究（2017~2022年）》为题介绍了桑树脚唐宋大型建筑基址群的概况，占地面积20余万平方米，2017~2021年勘探并连续发掘了晚唐至杨吴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2022年发掘深化了对一号夯土墙（Q1）的认识，推测其为中唐和杨吴时期子城的南墙和罗城的北墙。这些重要遗迹的发现为复原唐宋时期扬州城的格局及其变迁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解峰研究员的汇报题为《渤海国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他系统梳理了西古城、上京城、八连城等渤海国都城的考古发现历程，认为既往考古工作奠定了渤海文化考古研究基础，建立了东北亚古代都城制度的学术标尺，但在建筑遗迹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上京城是否实行里坊制度等问题上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今后的工作要注重系统提取考古学信息，并将“城市考古”“聚落考古”的理念贯穿其中。

太和城与唐宋时期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

汪盈 周然朝 周毅恒



研讨会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副研究员以《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的考古新收获》为题，介绍了2022年辽上京皇城南门大街西侧一号基址（J1）的考古发掘。经关键解剖发掘的夯土台基和磉墩，证实了该建筑在辽金三次大规模营建，依次编号为金代J1A、辽代J1B和J1C。J1三次营建均为南向大型殿址，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辽代大型南向建筑。J1台基规模和开间尺度均超过了目前发掘所见官殿建筑，说明该建筑从辽代始建开始，就是都城内地地位显赫的皇家建置。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阳副研究员的汇报以《黑龙江阿城金上京城东南部建筑址发掘收获和认识》为题，介绍了金上京遗址2022年的考古工作，该年度的发掘于皇城东南部清理出一座建筑址台基、一座小型房屋、三条道路以及两座窑址等遗迹，所揭示的建筑基址结构清晰完整，建筑布局规整有序。尤其是多处早晚叠压遗迹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该区域至少在金代早晚两个时期的遗存，所获资料对了解金代建筑技术、皇城內建筑时序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信研究员的汇报题为《河北元中都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通过对元中都遗址1998—2003年、2012年、2016年、2022年四次考古发掘成果的综述，认为元中都都是蒙元四都中结构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明确、晚期破坏最少、具有纪年意义的重要都城，对城市考古、建筑考古、捺钵制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等课题研究有重大价值，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都城制度研究的理想之城。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副研究员以《明中都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题进行交流发言。他表示，明中都考古发掘以“布局、规制、工艺、过程”为学术目标，主要围绕城垣、城墙体系、前朝宫殿院落和宫城内外水系开展工作。考古工作深化了对城址布局的认识，明确了多组单体建筑的形制结构，从土作、石作、砖作、瓦作等多方面了解了城址建筑的建造工艺，并初步勾勒出城址的营建次序。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变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任董新林、研究员钱国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对各位专家的汇报作了精彩点评，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认识看法。

研讨会闭幕式由董新林主持，钱国祥、孙华进行学术总结，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戴宗品研究员致闭幕辞。在接下來的学术交流中，与会专家实地考察了太和城五指山遗址、卫城刚城遗址、太和城遗址2021年和2022年发掘区揭露的建筑基址，并查看了太和城遗址标本库房，随后在考古工作站进行了座谈交流。在遗址发掘现场，专家们对揭露建筑基址的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其功能性质及年代展开热烈讨论。并对太和城遗址考古存在问题及解决思路对策、关键学术问题梳理及今后重点工作、遗址公园建设及遗址保护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太和城是南诏政权统一洱海区域后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在以太和城为都期间南诏统一了云南并将势力范围扩展至周边，奠定了中国西南疆域基础，通过对疆土的经营管理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系统深入开展太和城考古工作，揭示城址布局沿革及规划思想，对认识唐宋时期中原与西南边疆的紧密联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揭示西南边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专家意见建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坚持精细化考古发掘、多学科合作研究策略，广泛吸收城市考古的先进理念和方法，进一步做好太和城考古发掘及价值阐释工作，加快考古发掘成果转化，为遗址保护利用提供坚实的考古学支撑。